

我心中的父亲

杨晨微



我的父亲是浙江省第一批45名援藏干部之一，父亲是最年轻的一个。回到家乡后，援藏干部们心里始终牵挂着“第二故乡”，他们通过微信群，平时相互问候，分享西藏的相关信息。

去年，父亲接到市委组织部电话，通知他去领援藏30周年纪念徽章。我端详了一番，徽章精致气派，还配有一条折叠整齐的绶带。我小心取出，将它挂在父亲胸前，调侃他像二战老兵，父亲听后哈哈大笑。这温馨的场景，瞬间将我们一家子的思绪带回到30年前……

在父亲援藏的三年里，父亲这个角色无疑是缺失的。

我永远记得那一天，父亲穿戴整齐，狭小的乡政府大院被送行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，还有媒体现场采访。那时候我只有三岁，被母亲抱在怀里，懵然无知地看着这一切，父亲亲了亲我后转身离去，就像平时去上班一样。我一点都没有哭闹，反而很好奇为什么今天如此热闹，为什么大家都投来关切的目光，还拍拍我的肩膀。

过了两天，见不到爸爸的我开始哭闹，不肯吃饭。母亲哄我说：“爸爸临走之前不是跟你‘约法三章’要好好吃饭，回来检查你长没长高，你不是答应爸爸了吗？”

我哭着点点头，接着反问：“三天都到了，爸爸怎么还没回来？”年幼的我根本没有时间的概念，把三天当成了三年，觉得三天到了爸爸就该回来了。

“等你长高了爸爸就回来了。”母亲只好这样说，要是长高了，还要写信向爸爸汇报呢！

其实我知道母亲也思念父亲。父亲临走时有几双鞋子放在鞋架上，母亲想父亲的时候就会去擦鞋子，想着父亲回来就可以穿，鞋子被擦了一遍又一遍。

从那以后，我似乎长大了许多，每次吃饭都很主动，吃好饭自己出去玩，和小伙伴玩捉迷藏，在小树林里爬坡，或者跟一只名叫“扭扭”的白色小狗对话。回家后也不敢随便提“想爸爸”，怕母亲听了难过。

过了一年，我跟着母亲一起进城，搬到县政府一幢干部宿舍居住。白墙上被我密密麻麻画满“全家福”。我想吃披萨的时候，就画爸爸陪我吃披萨；我想坐碰碰车的时候，就画爸爸陪我坐碰碰车；我想爸爸陪我写作业的时候，我就把老师奖励的大红花贴在爸爸的手背上。想到什么画什么，墙上全是爸爸，只有我自己能够看懂，那是我思念爸爸到极致时的一种宣泄。

就这样，墙上的“爸爸”陪我安然入睡，陪我度过每一天。

第二年的秋季，阳光照射到大院里那棵粗壮的梧桐树上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我趴在窗口，看着那卷曲成蝴蝶状宽大的叶子，在秋风里旋转、坠落，像一个个有灵魂的精灵，在天地间优雅地舞蹈。

日子像老树扎根原地，在年轮里慢慢打磨，肆意蔓延着绵长的愁绪。

“囡囡，爸爸回来了！”我回过头看到一位头戴毡帽、头发长长、又黑又瘦的“叔叔”伫立在门口。这与脑海中的爸爸完全不一样。

母亲提着父亲带回来的包裹跟在身后，提醒父亲赶快摘下头上的帽子。当父亲蹲下身来抱我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爸爸回来了。这突如其来的幸福顷刻间将我淹没，我甚至没来得及喊出“爸爸”就大哭起来……

父亲回来后，我的性格开始变得开朗、外

向。当时父亲经常带着我参加各种活动，我总要展示才艺吸引大家的目光，一会儿要表演倒立，一会儿要表演唱歌，一会儿要表演翻跟斗，逗得边上的人捧腹大笑。只要有人起哄我就唱，边上有人鼓掌我就更起劲了。

有一次父亲带着我去单位，走开才五分钟，我就爬到他对面同事的桌上，从一张桌子跳到另一张，玩得亦乐乎。

我的“丰功伟绩”在父亲单位里广为流传，最著名的当属“冲击会场事件”。

父亲援藏期间，孤独与思念仿佛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共生共融，一度压抑着我稚嫩的心灵，逼着我寻求情感上的转移与共鸣，选择在大自然里尽情释放；对亲人的渴望，只能通过想象来化解，指引我在梦里编织出各种美丽的童话。之后，父亲改变了教育理念，再也不压抑我的天性，也不反对我和小伙伴们玩耍，属羊的我，像一只真正的小山羊在山坡上肆意奔跑，十分欢脱。

小学二年级那会儿我非常调皮，经常藏在床底下、柜子里，和家人玩捉迷藏。

那天，我又躲到床底下，准备给下班回来的父母一个惊喜，结果意外发现床底下放着一个包裹，里面有几封信。我取出摆放在最上面的一封，打开一看，只是看到信件开头赫然地写着“阿爸”两个字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。信笺上的字迹工工整整，夹杂着我不懂的文字，但我能感受到里面饱含炙热的情感，这让我无比惊讶，同时也有些吃醋。

“爸爸除了我，难道还有别的宝贝？”这是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想法。想到这里，我慌忙寻找母亲，边哭边告诉她信件的事。母亲起初大惊，当她看完信后反而哈哈大笑。她解释，给爸爸写信的是在西藏读初中的藏族哥哥格桑——爸爸资助的贫困生，这封信是格桑哥哥给爸爸看他的学习成绩单的。

原来，当时西藏的学校条件比较差。可是，孩子才是西藏的未来，教育才能改变落后啊！为此，援藏干部回来后，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，资助贫困孩子读书。援藏干部约定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资资助藏族孩子上学，直到学业结束。当时他们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几百块，来回寄一个包裹得花费上百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父亲说，援藏干部的家属们都很支持，孩子们也很争气。

父亲说，藏族孩子从小就被赋予了一定的家庭责任，他们帮助家里做家务，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，还要参与各种劳动。相比于他们，我就幸福多了，家里不愁吃穿，还上了当地知名学校。想到这里我就释然了，我也觉得老爸应该资助格桑哥哥，让他完成他的梦想。

藏族孩子不容易，援藏干部也不容易。

那时候没有手机，亲人间的联系全靠邮件，路上来回需要个把月。西藏那曲海拔高严重缺氧，生活条件艰苦。据父亲的战友透露，父亲因为感冒高烧用错了药造成休克，差点把性命丢在那里，这个事儿他一直瞒着我们。记得父亲援藏第一年，省委组织部为了让援藏干部与家属过一个好年，特意在新年晚会上增设了两地通话环节，分配到每位家属的时间不超过两分钟。母亲转乘了一天的车到达杭州，晚上与父亲通了电话，很开心听到了父亲的声音，虽说意犹未尽，但足以温馨和满足。

援藏期间的所见所闻，像一股原始干净清泉，不知不觉中洗涤了父亲的心灵，在时光的沉淀中，显现出原本的清澈。

都说父爱如山。年近六十的父亲有些发福，岁月染白头发，时光在他脸上留下纹路，让这座“山”显得更加沉稳与通达，散发出爱的光芒。

深沉的父爱，愿意用生命为我撑起一片辽阔明明的天空，让我沐浴到人生最温暖的星光，我的父亲，是我一辈子的骄傲。

羌塘的草

蒲霞

草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，被春风吹绿被阳光照耀，以小小身躯成为大自然永恒的主题，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，与戈壁、湖泊、山川一道，形成了西藏面积最大的纯天然草原，养育成千上万的牦牛和羊群，守护高原生态，形成了“世界屋脊”的天然屏障。说到羌塘的草，不得不提到藏沙蒿，它是中国的特有植物，常成丛生长，主根木质粗壮，根状茎粗短，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，适应性极强，生长于海拔3600米至5300米的地区，在山坡草地、高山草原、湖边沙砾、砾质坡地……随处可见。它富含脂肪，夏季青草丰富时，释放特殊的异味，让牲畜暂时远离；进入秋季，霜降一过，异味明显减少，又成为羊类最喜欢的食物，为羊群快速上膘提供营养；在冬青枯草时节，又成为牛、马、羊的主要食物。它同时还是一种药物，味苦、性凉，具有清热、凉血的功效，常被当地百姓用于疮疡、血症等症的治疗。



那一抹绿

高玉洁 摄

一枚鲜荔枝 窥见大历史

——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观后

李凤玲

近日，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在央视八套完美收官。这部根据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未播先热，播出之后更是热度不减。作为马伯庸的忠实书粉，我一集未落地追完了全剧。个人以为该剧无论题材选择、结构安排还是主题呈现，都是成功的。
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杜牧的这句诗可谓家喻户晓，马伯庸应该就是以此切入，写出了《长安的荔枝》。在剧中，荔枝鲜美，但难储运，更何况是五千里之遥的岭南。但古人还有诗云：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于是乎，集“三千宠爱在一身”的杨贵妃有了要吃岭南鲜荔枝的任性要求，而上林苑的小吏李善德（雷佳音饰）阴差阳错接下了这个眼瞅着就是掉脑袋的差使。出身算科的他，为了不至家破人亡，真的就是动用了自己所有的智慧，倾尽全力想要将荔枝转运成功。他说：“即便是失败，我也想知道我倒在离终点多远的地方。”于是围绕着一枚小小荔枝，各种的保鲜之法被绞尽脑汁地想出，各种时间和距离的计算被细密地解析，“千方百计”之下，只为了能在六月初一即杨贵妃的生辰之日，将荔枝运抵长安。而围绕着荔枝转运，我们还看见了当时的朝堂之争、职场之道，以及长安、岭南的风土人情。我们

看过的历史剧不少，但围绕着一枚荔枝展开的题材，还真不多见。其中有历史的真实，亦有文学的想象，我们从中看到了大唐的繁华与盛世，亦能窥见其即将走向衰落的必然和內因。

除却题材的新颖，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其结构安排也堪称精巧。其一便是每集的开头都有一节小序幕，通过这序幕拥有了各自出彩的人物小传。这些小传补齐了情节，丰富了人物，有助于观众更好地理解全剧。

《长安的荔枝》结构之精巧，小序幕的使用只是其一，其二便是它的双线结构。一条线是负责荔枝转运的李善德，另一条线则是卷入了朝堂争斗的郑平安。郑平安这条线在原著中是没有的，但即便是作为原著粉的我亦认为这条线加得非常必要而且成功。影视剧毕竟和小说不同，它是用镜头语言来说话的，原著中的单线内容确实不够丰厚，这不利于电视剧情的呈现和主题的表达，自然也就影响观感。而在剧中同时展开的这两条线，没有明暗和主副之分，它们是并行的。但并行不等于平行，此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交叉和互相的关联。毕竟“贵妃要吃从岭南运来的荔枝”这一不仅任性而且完全称得上就是腐败的无理要求，原本就是大唐逐渐走向衰

败的一个侧面展现，亦是安史之乱之前的最后挣扎。

因此，《长安的荔枝》不仅仅是写荔枝，它也是在写历史。它是透过一枚小小的荔枝，剖析出了更多深层的东西。原著作者马伯庸最擅长以小见大、借古喻今。在剧中，明面上展现的是关于荔枝的保鲜和转运之法，暗地里却牵扯到了从职场到官场、从家庭到朝廷的方方面面。其中有古代职场上各色人等的不同嘴脸（这一点似乎完全可以与当代职场相互映照）；更有朝堂之上的尔虞我诈，难辨忠奸。繁华熙攘的盛唐之下，包裹着的是山雨欲来的暗潮汹涌。这也正如该剧结尾的一幕：一枚果皮红润看似新鲜的荔枝，实则已经腐烂败絮其中。而那运送成功汁液甘甜的荔枝，李善德将其中一枚摆在了亡妻的坟头，一枚放在了女儿袖儿的口中。这一结局的处理与原著也不同于个人以为修改得亦相当成功。李善德，他只是个小人物，但面对腐败的王朝他敢于直谏和抗争；李善德，他又是个大丈夫，面对各方的威逼利诱，他带着女儿远避岭南，过得心底坦荡，云淡风轻。

一枚鲜荔枝，品咂世间事。《长安的荔枝》，正是透过这道历史的小小缝隙，窥见了波谲云诡的大历史。

谚语里的三伏天

王婉若

“小暑不算热，大暑正伏天”，蝉鸣声里刚泛起暑气的苗头，村口老槐树底下就传开了这句老话。三伏天像个藏不住性子的壮汉，带着“冷在三九，热在三伏”的威名，踩着小暑的尾巴就撞进了七月。那些散落在田埂、灶台、屋檐下的谚语，像撒在暑日里的种子，一茬茬长起来，把三伏天的热、雨、忙、闲都串成了活的景致。

头伏一到，日头就多了几分劲道。“头伏有雨，伏伏有雨”，农人们瞅着天边的云色念叨，要是头伏落了场透雨，整个伏天就不愁墒情。可若是“头伏旱，伏伏旱”，地头的玉米叶就得早早卷起来，汉子们扛着锄头下地时，脊梁上的汗珠摔在土坷垃里，能砸出个小坑。这时候最信“伏天深耕田，赛过水浇园”，正午日头最毒时，滚烫的泥土被翻过来，蒸腾起白茫茫的热气，杂草根须在暴晒下蜷成枯丝，“伏天锄地，胜过施肥”的道理，就藏在这一身臭汗里。

“头伏萝卜二伏菜，三伏还能种荞麦”，菜畦里的活计跟着谚语走。头伏撒萝卜籽要趁“天凉”，天蒙蒙亮就下地，用手指在湿润的土

垄上按出小窝，点上籽再覆层细沙，“萝卜点在伏头上，大小似秤砣”。二伏栽白菜苗得赶“潮”，清晨带露起苗，傍晚带湿移栽，“二伏栽菜，没雨不采”，要是赶上阴天，成活率能高一成。到了三伏，北方的坡地上常能看见补种荞麦的身影，“三伏种荞麦，只等霜降来”，这些耐折腾的作物，在暑气里扎下根，就能赶在秋霜前结出饱满的籽。

中伏的热是不讲道理的，“中伏热得透，立秋凉飕飕”成了盼头。柏油路晒得能粘住鞋底，墙根下的狗吐着舌头直喘，“中伏穿棉袄，秋收打赤脚”的老话，是怕这热劲不足。南方的伏天裹着水汽，“三伏天，汗如泉”，刚晾出去的衣裳转眼就湿透，可“伏天的雨，锅里的米”，一场雷阵雨下来，屋檐水流成了帘，菜地里的茄子、辣椒“喝”足了水，第二天准能蹿高一截。雨后的日头更毒，“雨打伏头，晒死牯牛”，晒得玉米叶卷了边，却让藏在穗子里的虫子闷死了不少。

老辈人还信“伏天戴草帽，胜过喝凉药”，出门必戴顶麦秸编的帽，说是能“隔三分暑

气”。午后歇晌时，摇着蒲扇讲“伏天不热，五谷不结”，说这暑气是给庄稼催熟的；看见小孩贪凉睡在风口，就念叨“伏天睡石碾，老来骨头软”，赶紧抱进屋里。傍晚搬个小马扎坐在院里，瞅着天上的星，说“伏天星密，雨多水溢；伏天星稀，地裂土饥”，盘算着明天要不要去浇地。

到了末伏，暑气里掺了些凉意，“末伏凉，五谷长”成了新盼头。清晨的草叶上凝着露水，“末伏露，好收谷”，谷穗子沉甸甸地低着头，穗尖的颗粒开始泛黄。这时候最怕“末伏连阴雨，损稻又伤黍”，晒场上的豆子刚摊开，就得盯着天收。“伏尽秋来，昼夜凉开”，过了处暑，傍晚的风里有了清爽，老人们说“过了三伏节，夜寒白天热”，却也明白“伏天雨多，秋天粮多”，那些在伏天盼过的雨、受过热，都要在秋收里结出果来。

这些随口而出的谚语，像伏天里的树荫，把日子遮得有滋有味。热也好，雨也罢，都在这些句子里找到了去处，让每个滚烫的日子，都踩着时令的节拍，走得踏实安稳。

我们的60年

60年的海拔

——写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

咚妮拉姆

冰川念着古老的诗词
喜马拉雅的石头
在历史台阶
兑换阳光的金币
牦牛脊背的曲线
延展成长长的路与桥
文成公主未唱完的歌
流淌亚洲水塔的节奏
青稞抽穗的背面
倒映着村庄新貌
学校、医院的露珠在耀闪
牧人扬起的皮鞭
弧度着移动网络的弦
60年不长也不短
智能在晨跑
光纤计算的未来
谁在描绘幸福笑颜
60年的海拔
科技飞跃发展，精神拔节生长
哈达与云端航线共舞
迎着五星红旗的春天